

# 普通的粉条、当掉的大衫、血染的党证…… 聆听这些文物背后的初心故事

在全国各地的红色纪念馆内，几乎每件文物都映照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及人文精神，让更多人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应该是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 一根粉条里的初心



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纪念馆内的三军会师纪念馆里展出的当年红军用过的粉勺

一根普通的粉条，在不少人吃火锅、酸辣粉时可能才会被注意到。但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种用马铃薯淀粉制成的粉条却意义不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粉”或“红军粉”。

西吉县位于曾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这里地处宁夏南部山区，气候温凉，适宜马铃薯生长，马铃薯一度成为当地群众的主要口粮。白色粉条被称为“红粉”的背后，有一段“仁义之师”与当地群众鲜为人知的故事。

事情得从80多年前说起。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作为第一支进入宁夏的红军队伍，途经宁夏西吉县的兴隆镇。这里是回族聚居区，红军充分尊重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被当地百姓称赞为“仁义之师”。红二十五军短暂休整后离开时，几名伤员借住在西吉县兴隆镇的老乡家养伤。这些红军伤员来自南方，看到当地老百姓仅靠蒸、煮等方法食用马铃薯，便开始教他们如何利用马铃薯制作粉条。

红军战士先把马铃薯切成碎块，再使用石磨将碎块磨成淀粉汁，之后用粉勺把淀粉汁漏成条，开水煮熟后捞出晾干，即成粉条。这样的工艺经红军教授后，就在当地流传开来，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

“当时，住在村里的红军伤员手把手教我大爷爷和村民做马铃薯粉条，没想到这成了我家几代人的谋生手段。”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摆世明说，从他大爷爷开始，一家四代都以制作这种粉条为生。

在当年的兴隆镇，留下的不仅有粉条，更有红军与当地百姓的深厚情谊。

“村民们倾其所有悉心照顾红军伤员，伤员们在传授村民制粉技术的同时，也帮村民干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农活。”摆世明回忆道。

虽是小小一根粉条，但对当地百姓而言，可谓一件大事：马铃薯不易贮存的难题被破解，老百姓的温饱也有了着落。

令人欣慰的是，这项制作马铃薯粉条的技艺，80多年来在王河村从未断绝，一直传承至今。

如今，小粉条给村民带来了大收益。王河村加工粉条的农户最多时有120多户，靠加工出售粉条，王河村“红军粉”的名声逐渐叫响，“红军粉”成了村里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当地以贩卖粉条为主的运输业也随之兴起。

在粉条产业的带动下，王河村于2015年脱贫销号，2018年年底，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万元。

王河村出产的粉条，虽然厂家、商标各不相同，但包装背面都会写上一段关于红军教村民做粉条的故事，有的还会在包装显眼处写上“红粉”“红军粉”等字样。

在当地群众看来，将这种粉条称作“红粉”或“红军粉”，是纪念，更是感恩。

“当年红军教村民们制粉，跟如今党和政府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是一脉相承的，时间在变，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没有变。”兴隆镇党委书记慕凤说。

## 一件多次被当掉的大衫

“杨靖宇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时穿的大衫和用过的褥子，1996年该文物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确认为一级文物。”东北烈士纪念馆、东北抗联博物馆馆长刘春杰介绍说。

图片上的这件遗物是杨靖宇1931—1933年在哈尔滨进行抗日活动时穿的大衫。收藏

这件文物的人是满洲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姜椿芳的母亲(以下称姜母)。

1952年，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去姜家，姜母才知道杨靖宇已于1940年壮烈牺牲。姜母十分悲痛，流着泪将一直珍藏在家中的杨靖宇的这两件遗物取出来，郑重地交



1931—1933年杨靖宇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时穿的大衫

给何成湘，请他把这两件烈士的遗物转交给东北烈士纪念馆，作为教育后人的历史见证。

姜母回忆，1933年5月中旬，杨靖宇假扮生意人，回到哈尔滨。在姜家住了一个来月，像一家人一样，有空就帮助姜母做家务。

6月初，杨靖宇要返回南满，继续领导南满地区的武装抗日斗争。由于经费的问题，临行前，杨靖宇再次把他从当铺赎出并穿用了近一个月的大衫和褥子送进了当铺。他将当票交给姜椿芳的母亲代为保存，预备再回哈尔滨时赎出来继续使用。但是，此后杨靖宇在南满率领抗日武装于枪林弹雨中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抗战，直至1940年牺牲，再没回过哈尔滨。

当票赎回快满时，姜母悄悄把大衫和褥子赎了出来。1936年，姜母随姜椿芳离开哈尔滨去了上海，她一直保存着这两件衣物，还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还给杨靖宇。听完这段故事，在场的人无不悲伤热泪盈眶……

## 一张被鲜血染红的党证

在豫皖苏皖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陈展着一张独臂将军陈波(原名陈汉清)血染的党证，它是1934年在川陕苏区颁发给优秀共产党员的，当时共颁发了两千张，但建国后仅发现这一张。这张血染的党证，见证了陈波

将军传奇的一生。

1929年初春，20岁的陈波在黄安(今湖北红安)七里坪参加红军。因为他当过裁缝，组织上分配他到被服厂工作。同年7月的一个夜晚，被服厂党支部在一棵大树下召开支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秘密阶段举行的特定方式：借助夜幕，不准点灯，也不必举手表决，只需说一声“我同意”或者“不同意”就行了。在这个“黑灯”会上，陈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在川陕苏区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党组织为激励广大党员奋勇前进，决定给优秀共产党员颁发党证，这是党对自己儿女的一次全面审查和政治考验。每一位党员都要在支部会上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简历、作战表现等，再经群众评议、支委会通过，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才能签发党证。

在评议颁发党证的支部会上，宣传委员徐向前说：“我们的支部书记陈汉清同志出身贫苦，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同意发给党证。”陈波领到党证后，十分珍惜，特地缝了一个小皮囊绑在腰带上，专门放置党证和党费的铜钱。

1941年3月的一天，时任八路军前总务团副团长的陈波向战士们介绍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并开始做示范。他命令大家后退



独臂将军陈波血染的党证

300米，然后抱起西瓜大的滚雷向山丘走去，团长欧治富拦住他说：“这是新制的，有危险，我来吧！”陈波说：“你是一团之长，还是我来吧！”待大家进入安全地段后，陈波开始按雷、擦火，“啪”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陈波倒在了血泊中。

经过奋力抢救，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仅剩一条胳膊和两条无法弯曲的腿。醒来后，他用仅有的那只右手摸到裤带上，发现少了什么，便焦急地问护士：“小皮囊呢？”护士不明其意，陈波解释说：“火柴盒大小，裤带上的。”护士将他的血衣翻遍，终于找到被鲜血浸透的小皮囊，党证也已指鲜血染尽。

受伤后的陈波，虽说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但他决心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为抢夺东北的抗战果实，向东北大肆增兵，我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组建了“赴东北工作干部团”，简称“东干团”，紧急向东北驰援。陈波看到东北的紧张形势，便向中组部提出要参加“东干团”，领导似乎在故意考验他，指着那匹烈马说：“上马兜一圈，不从马上摔下来，就让你去。”陈波接过缰绳，右手一按马背，稍一纵身便越上马背，十多分钟后回到了原地。就这样，他成了“东干团”的一名特殊成员。日军投降时，按照党的指示，陈波一个人接收了日军的一个军用仓库，他昼夜守卫，枪不离身。后来为支援东北而仓促赶来的359旅官兵在为棉衣和枪支弹药发愁时，陈波挥动着仅剩右手的拳头说：“快来拿吧，这儿应有尽有。”右军官兵们不仅得到了充足的物资，也从这位身残志坚的老红军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激励。

艰苦的长征、血战甘南、宁夏、山西……赴延安、战东北，多少次，行军作战，汗水把陈波的党证浸透，多少次，沿途的奇寒把党证上的汗水凝成冰渣。在穿越鬼子的封锁线时，为防备落入敌手而暴露身份，许多人都把党证销毁了，陈波说：“就凭我这一只胳膊两条腿，不是红军就是八路，有无党证一个样，落到敌人手里都是死。”所以他一直揣着党证打天下，伴随党证渡难关。

这张小小的党证，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大历史转变，也见证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赤诚之心。

□李源 往事

# 抗战中的老舍

## 老舍文学地图上的重庆

老舍先生的写作是围绕着几个都市展开的。北京、伦敦、青岛、济南、武汉、重庆、纽约……他一生在多个城市生活创作，阅读“城”与“人”，留下了不少经典文字，有些篇目甚至构成了人们认识那座城市时必须读的“文化手册”。

若是为老舍先生勾勒一幅“文学地图”，北京自然是最令人瞩目的中心，是老舍创作的灵魂与根脉。老舍喜欢的城市，大多带着些安静的古韵。如果还能够清洁，有秩序，亲近自然，那就近乎完美了。不同于北平、济南、伦敦等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老舍在抗战时期生活工作的重庆较为特殊。它是在战争急潮的裹挟下，老舍被迫前往的一座城市，但同时也是老舍一生中重要的文学驿站，是老舍“文学地图”上的显眼坐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舍先由青岛前往济南，在齐鲁大学任教，后南下到达武汉，又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总会西迁重庆。关于这段足迹，老舍在抗战胜利后的《八方风雨》一文中，揭示了其背后普遍的战时文人心理。抗战初期，在山东授课的老舍内心焦灼，他日夜恐惧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担心自己会成为敌方的“俘虏”或“被捉去被逼着做汉奸”。而此时，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已踏上各自的行程，老舍眼看着“故人南北东西去，独领江山一片衰”(《诗三律》)，他终于下定决心，暂别妻儿，逃离“亡城”(即沦陷区)。老舍称之为“跟着国旗走”。这一选择意味着在极端的战争环境下，舍弃个人家庭的团圆，保存“读书人气节”，奔赴“抗战大业”。

1942年，老舍借话剧《谁先到了重庆》，将这种心态传达得更为鲜明。“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首都，成为了国族的符号和抗战的中心，很多爱国志士愿意亲身赴陪都参与抗战，而剧中主人公在沦陷北平以死殉国，恰恰完成了一次象征意义上的“到达重庆”。老舍选择跟随国民政府西迁，在战时首都继续自己的文学生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作家对“大时代”的理解方式。

1938年至1945年，老舍在重庆生活的7年间，曾随北路战地慰问团前往西北考察访问，也曾赴云南讲学，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聚首交流，但更多的时间则是忙于重庆文化界的各项工作和自己的文学创作。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老舍的创作观念和作品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尝试了多种此前并不熟悉的民间文艺形式，如鼓词、旧剧、长诗等，丰富了战时中国面向大众的文艺实践。

## “作家”老舍的抗战之笔

新中国成立前，老舍曾在各类文章中称自己为“作家”而非“作家”。一字之差，似有深意。老舍的挚友、剧作家曹禺将其解读为老舍的自谦。不仅如此，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自己的关系，老舍也多以局外人的角色自况，认为自己一直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身处“平沪两大文艺大本营”的边缘。然而，这一姿态在抗战大潮中被赋予了更多内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舍怀着高昂激扬的抗战情绪完成了《大时代与作家》一文。他期待着以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身份融进这个“大时代”，希望能够在“神圣的战争”中，创作出“伟大的文艺”。抵渝后，老舍又在多篇“述志”之文中反复强调自己的“作家”本色，但不同于仅仅写作小说、散文这类纯文学作品，他认为，应当通过分担一些切实的文艺工作，去真正理解眼前的“大时代”。

在战时重庆，老舍因此前出色的文学成就和无党派背景，被推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他牺牲了个人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忙于编辑刊物，召开会议，处理文件，发展分会，接待各地作家，与世界其他文化组织联系。“文协”中这些繁琐的事务实际上都仰赖老舍的四方奔走。他除了要组织文艺活动，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还需要不时出面缓和与政治舆论压力。老舍的勤恳工作对于团结后方方的文艺力量意义重大，也正是战争的“大时代”，赋予了老舍在书斋和课堂之外的崭新角色与更大能量。

繁忙工作之余，老舍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笔耕不辍。战时的重庆遭受着日机的频繁轰炸，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加之酷暑难耐，鼠患严重，老舍又感染了盲肠炎，贫病交加的老舍却始终坚守着一种“不停地写作”的作家姿态。可以说，作为“作家”的老舍形象，最真切地体现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文艺工作中。“作家”老舍最心爱之物自然是手中之“笔”，“笔”成为抗战时期老舍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将“笔”视作为自己“唯一的资本”，将文人之笔喻为战场之枪，渴望通过写作“把热血洒在纸上”。重庆时期，老舍对“笔”的功能也有了新的认识：“我的笔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有实际的功



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文协的过去和将来》)

在战时重庆，老舍将自己的抗战之“笔”投向了两大大创作领域。一方面，他致力于民间大众文艺的探索，在大后方掀起的“通俗文艺讨论”热潮中，老舍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动手制作”作品的人，他曾向多位民间艺人学习韵律和腔调，希望从中找到战争年代文艺发展的新资源和新方向，使战时文艺真正起到宣传和教育的效果，鼓舞民心。另一方面，老舍则延续他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追求一种具有“史诗般”品格的宏大作品，如在1942年写作的《火葬》和1944年开始写作并在抗战胜利前完成了三分之二篇幅的《四世同堂》中，老舍均将自己从重庆获得的战争经验与此前熟悉的北平生活相结合，讲述最普通的市井小人物与战争这一“大时代”的关系，反映了老舍对平凡百姓的朴素爱国愿望的关注。

从在济南怕做“亡国奴”的恐惧，到汉口时期高昂的抗战热情，再到重庆艰辛的“作家”岁月，这些经历都深刻地影响了老舍的作家观和文艺观。1946年初，老舍从重庆飞抵上海，准备赴美讲学，开启他的“作家”生涯的另一段旅途。素有“京味儿作家”“幽默大师”称号的老舍，其丰富性远不能被这些标签所概括。老舍说，“抗战给中国照了‘爱克斯光’”。战争的烽火让人们重新审视“作家”、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而从老舍的重庆时期来看，他以一种最本色当行的“作家”姿态，追问着他自1920年代以来关切的大问题：文化中国究竟应当如何生存，如何把握“大时代”的契机，改造自身，充实自己。

□秦雅萌 人物春秋

如今，有不少人选择在春节假期外出旅行。一个好的住处会为旅途增色不少。因此，一到假期的酒店和旅馆往往很早预订一空。如今的旅行、住宿费非常发达。那么，在物质条件不够丰厚的古代，人们如何解决住宿？古代的旅馆业又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 周代就有驿传可供住宿

我国最早类似于“旅馆”的场所叫做“驿传”，是供古代传递文书人员及诸侯往返都城途中居住的旅店。史载周初时为了方便各方诸侯纳贡和朝觐，驿传已经非常普及。当时，在通往都城的道路上多有驿站，四方来朝者便可寓居客舍，所谓“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市有侯馆……以待聘聘之官也”便是如此。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官用的“驿传”，民间商业性客舍也有了发展。繁盛时几乎遍及各地，名为“传舍”或“逆旅”。另外，《左传》中还记载了郑国思想家子产曾在郑国建“诸侯之馆”，以迎接诸侯的到来，算得上诸侯国的“国宾馆”了。

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驿传制度。汉承秦制，驿传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交通要道上大约每30里设一驿，相当于一个交通站。里面备有马匹、饲料、饮食、床铺等一应接待设施，并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在西汉都城长安，传舍星罗棋布，不仅有供各郡来客住宿的“郡邸”，而且还有专门接待外宾的“蛮夷邸”。

南北朝时，民间旅店发展很快，几乎遍布于城乡，许多王公贵族发现旅馆业的赢利可能而竞相建置。一时间，大量的社会资金都投向了旅馆业。当时出现了“邸店”，除供客商食宿外，还有供客商存货和交易的场所。当时的皇室看到这有利可图，便通过各种方式排挤、吞并民间的邸店。

“旅馆”一词也初见于南朝。南朝宋谢灵运《游南亭》诗有云：“久痾昏垫苦，旅馆眺郊歧。”到了隋代，大运河建成，一时间“商旅往返，船乘不绝”，为了满足商旅食、宿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广造旅邸”的潮流。

## 唐代旅馆业兴旺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旅店也在此期间获得巨大发展。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迅速恢复了地方向皇帝朝觐的制度。由于天下方定，各方建设刚刚徐徐展开，外地来朝觐的官员来长安后只得暂时住在接待商人的客坊里，很多官员为此纷纷抱怨朝廷招待欠周。唐太宗闻知后立即下诏，在京城为朝觐官员建造“邸”三百余所，建成后李世民还亲往视察。

唐时有两种“国宾馆”，一曰鸿胪客馆，归主管外事接待、民族事务的鸿胪寺管辖，主要招待外来使臣。二曰四方馆，归“三省六部”之中书省管辖，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都设有四方馆。随着唐代旅馆业的兴盛，旅馆开始显现出

“馆”与“店”的明显区别：馆通常指较大的宾馆，包括公馆和私馆。驿站中还设有驿馆。“店”则多由民间开办，馆与店的食宿设施也有区别。

当时，有的大旅店兼营其他业务，如对外开设餐厅、安排货栈寄存、售卖各种商品以及兑换银钱，这种大旅店又叫“邸店”，带有食宿与商业结合的含义。

另外，由于唐代同外域各国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交往盛况，除了国家建的供各国使者的馆舍，在一些商业城市还有私人的“对外宾馆”，比如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地的“新罗馆”，就是专门接待新罗(唐朝朝鲜半岛国家之一)客人的馆舍。

## 元代出现了“饭店”

宋代同样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朝代，旅馆业同样繁盛，旅馆密集程度甚至超过了唐代。史载南宋都城临安私营客栈遍及全城，多设在闹市区、西湖沿线以及江干、城北等。

宋代的旅馆分类更为细致。小的旅馆由小商人甚至平民开办，有的小旅馆甚至只有一室。宋代洪迈编著的《夷坚志》中《木先生》一篇就记载了宋代一位官员汪致道曾“投宿小村邸，唯一有一间”。当时大旅馆的规模也非常大，一般由大商人、大官僚经营，如宋代沧州节度使米信曾在京城建造很大的房屋，外有田园内有邸舍，每月收入颇丰。

元代就有了“饭店”的记载。当时挂此字号的是民间饮食店或兼营住宿(提供铺席)的饮食店。这源于唐宋时期旅馆业的发展：唐末时“正店”(酒楼)和“饭店”兼营住宿业务的屡见不鲜。到元时便有了正式的“饭店”名称。“饭店”在元代是口语，历史沧桑，逐渐成为现代人们常用的名词。

明初，官方的驿站规模超过元代。全国要冲都设有驿馆、逆驿，铺间相隔10里，驿距相隔60里。“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驿’，以便公差往来。”

明中期，驿馆管理松弛，大臣张居正主张裁减驿传，但收效不大，造成明代“驿站”的时盛时衰。尽管明代官办驿，递每况愈下，但民间旅馆依然发达。

明清时期，除了民间的旅馆，会馆也非常兴盛。在京城，不仅有地区性会馆，而且还有行会会馆。“长安会馆知多少，处处歌筵占绍兴”就是明清时期会馆众多的最好写照。当时，北京的地区性会馆主要接待赶考的各省举子，行会会馆主要接待各地商人。北京会馆最多时达数百座，大部分坐落在宣武门外到前门一带。当时全国的其他地方也有会馆，苏州的会馆从明万历开始发展，多时达九十余座。

到了晚清，随着清朝国力衰微，由先秦沿革而来的会馆发展趋于停顿，但西方旅馆大举兴建，客观上使中国的旅馆业也逐渐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李学朴 钩沉